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朱浒
编

经元善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014017790

B25
30
V9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朱许
编

经元善卷



B25
30
V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北航

C17047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经元善卷/朱浒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0-18561-3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经元善 (1840~1903)-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9533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经元善卷

朱 浒 编

Jing Yuansh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31.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89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经元善，字莲珊（又作莲山，有时亦作连山、廉山），自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又号剡溪聋叟，笔名有沪滨呆子、汨罗江后学等。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原籍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今上虞市），但自幼年起即长期寓居上海，其生平主要活动也都集中在上海。

有关经元善的历史定位，以往学界的认知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条脉络。

第一条脉络是把经元善视为中国资产阶级起源时期的一个代表。最早明确表述这种认识的学者为张国辉先生，他在1979年出版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中指出，产生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旧式商人的上层中带有某种新倾向的人物”，经元善正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代表。^① 虞和平先生于1988年发表了学界第一篇系统研究经元善的论文，认为其“一生经过了从旧式商人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从洋务企业商董到资本主义改良活动家的转变”，将之定位为一个“早期资本主义改良实践家”^②。稍后，马敏先生在论述中国资产阶级的过渡形态即近代绅商时，亦将经元善视为“士人型绅商”的典型代表之一。^③

① 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② 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其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虞先生在《浙江学刊》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简论经元善》一文，是该前言的压缩版。

③ 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114～11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该书首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第二条脉络则将经元善视为具有较强本土经世传统的商人代表。此种看法以刘广京先生为最早，他在1988年发表的《商人与经世》一文中，便以郑观应和经元善两人为例，提请学界应注意晚清时期“商人对变法自强的经世思想，甚至对变法运动的推展都有贡献”，并认为“经氏之经世思想有独到处”^①。此外持此思路的为王尔敏先生，按其说法，经元善虽为晚清工商界“次要之人物，当时后世未必见重者”，然“亦表露其卓识高见”，且“投身商贾，而以儒为宗”，可谓是中国近代商人中一位不容忽视的“经世小儒”。^②

毋庸置疑，这两种认知各有其合理性：第一种认知主要反映了经元善向新社会身份转化的一面，第二种认知则强调了其在回应近代社会变局过程中所固持的某种传统特质。毫无疑问，经元善身上同时具有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也只有将这两方面的实践活动统合起来，才能完整把握经元善身上所体现的、旧式商人在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新陈代谢之路。

经元善是以旧式商人的上层人物的面目跃上历史舞台的，而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出身，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其父经纬打下的、大大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多方面社会基础。

经氏家族的商贾背景始于经纬，经纬亦堪称其家族中第一位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商人。经氏一族自定居上虞后，数世皆以耕读为业，至经纬出生后，家境益贫，甚至宗祠基地一度都被族人出卖。在这种状况下，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经纬年仅十五岁即“贸迁上海”，因“性勤慎，言笑不苟，戚党交器之，举司会计日赢”，故而“业愈廓”^③。其经营最为成功的产业有二，其一为仁元钱庄，其二为经正记沙船行。仁元钱庄是当时上海北市的汇划庄即大钱庄之一^④，曾于咸丰六年

① 刘广京：《商人与经世》，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期（台北，1988：09）。

② 参见王尔敏：《经元善之身世与思想及其上书保皇招祸经过》，见其著：《近代经世小儒》，351～36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③ 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光绪丁酉（1897年）刻本，卷1。

④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1856年)发行过清代上海最早的银币。^①经正记沙船行也颇具规模,咸丰五年(1855年)的一份资料称“经正记芳洲于药局弄同仁堂”,为当时“船商之最著者”之一。^②经纬之商业经营最盛之时,“积财至四五十万”之多,但因沙船业衰落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当经纬去世之时,他所留下的财产数目,“不过二十之一矣”^③。也就是说,经元善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有形资产是十分有限的。

当然,经纬留下的遗产并不仅限于有形资产。这是因为,经纬作为一名较为成功的商人的同时,还从事了其他许多社会活动,从而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无形资产。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笔无形资产,便是经纬在上海长期积极参与的慈善活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经纬被推举主持辅元堂,“时经费绌,悉心筹画,出己赀以广劝募”。次年兼办同仁堂事,于开办施医、义学及恤嫠、义冢诸善举外,“并禀办阖邑四乡掩埋”。未几又任育婴堂事,“集赀扩充,收婴至数百口”,且“早暮驻堂,察饥寒饱暖,甚至著有《恤嫠刍言》一卷”^④。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事,攻陷县城,经纬因育婴堂内数百婴孩、乳母“急切无可迁避”,竟以“全家作孤注”,誓与共存亡,小刀会众亦“义之,不加害”^⑤。同治二年(1863年),经纬鉴于同仁、辅元、育婴三堂“无恒产,经久为难”,乃首倡募捐,于华亭、金山两县购田五千余亩,作为永久堂产。^⑥因此,经纬在慈善方面的名声殊非泛泛,这方面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就连当时名动天下的江南善士余治都主动向其表示了结交之意。^⑦

经纬所积攒的另一笔重要无形资产,则是其与官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苏松太道宫慕久即委托经纬办理善后捐事务,经纬亦“慨助千金为创,款遂集,叙功得太常寺典簿衔”,由此成为一个亦商亦绅的人物。咸丰五年(1855年)初,清军收复上海县

① 参见[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董科、王亦铮、杨蕾译,220、22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② 参见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2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③ 经元善:《五誓斋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光绪癸卯(1903)增订再版本。

④ 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⑤ 史致晖:《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⑥ 参见应宝时:《应敏斋廉访仓房征信录序》,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⑦ 参见《事贤友仁录》,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城后，又受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委办善后事宜”^①。是年冬，苏松太道蓝慰雯等在上海倡建救生栖流局，复以经纬董理其事。^②次年，因海盗劫掠商船，经纬又受命“总董缉捕局”，并作为主要经手人从西商手里购买了“天平号”巡缉船。^③同治元年（1862年），经纬曾“募粮数千斛”解送左宗棠在浙江严州、衢州一带的大营。李鸿章克复苏州后，曾有意委派经纬办理“善后局事”，以他故稟辞。左宗棠收复浙江后，以关系江浙两省水利的海宁塘工久废，于同治三年（1864年）间札委经纬办理。此次工程任重费巨，经纬多方筹捐，亲临办理，次年初竣工。然经纬亦因此役而积劳成疾，不久之后即告病故，经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请赐恤，赠知府”^④。毫无疑问，经纬这种急公好义的精神，对于经元善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

经元善虽然在少年时代因战乱而一度颠沛流离，但自从17岁开始跟随父亲正式学习经商以后，其生活是相当安稳的。而在经纬去世后的十余年中，经元善的生活之路可谓既平坦又平淡。其平坦之处在于，作为家中长子，他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多方面遗产，除仁元钱庄外，也承袭了知府的官衔，以及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之职，从而顺利跻身上海绅商界的上层之列。说其平淡，则在于他在这一时期始终是一名中规中矩的普通商人和地方善士。直到年满32岁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才尝试过一次自独立经商以来的最大手笔，即聚资五万两前往扬州试图购买当时获利丰厚的盐票，最终却是一番徒劳。^⑤因此，直到年近不惑之际，他身上亦未显露出能够做出超过其父业绩的迹象。

经元善的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是光绪二年（1876年）爆发于华北地区的大旱灾即“丁戊奇荒”。这是清代历史上最酷烈的一次灾荒，旱情延续近四年之久，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面对

① 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② 参见蓝慰雯：《蓝子青京卿救生栖流局记》，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③ 参见史致晖：《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④ 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⑤ 参见经元善：《富贵在天说》，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如此奇荒，清政府因其财政能力的不足和传统官赈机制的限制，以致“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①。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助赈活动纷纷兴起，其中表现最活跃的便是江南地区的绅商社会。在无锡绅商李金镛于光绪二年底率先聚资前往苏北灾区开展救灾活动后，苏州绅士谢家福、扬州绅士严作霖和上海果育堂董事瞿世仁等人又与李金镛联合，继续举办了赈济山东灾民的行动，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江南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很快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型民间赈灾机制——近代义赈活动。^②

光绪三年（1877年）底是义赈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经元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时，刚刚结束山东赈务的苏州义赈同人率先发起了助赈河南的行动，并联合上海同人在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的募捐宣传。经元善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报刊开始注意到这场灾荒，遂主动协助果育堂开办助赈活动。^③而借助于自己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的背景，他很快适应了义赈活动的要求，从而在步入义赈行列不久便迅速成为一个重要人物。

光绪四年（1878年）初到六年（1880年）中，是经元善办理义赈的名声急剧上升的时期。四年春间，瞿世仁病故，经元善因此前活动中的突出表现，被上海同人一致推举主持收解赈款事务。四月（5月）间，上海同人又聚议添办秦赈（按：实为赈济河南接壤陕西地区的饥民），“公举元善总司后路赈务”。经元善以“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乃毅然将仁元钱庄暂时停业，“专设公所，壹志筹赈”。^④这是上海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协赈公所，更是一个非凡举动，经元善亦因此成为上海义赈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继豫赈之后，他又和郑观应等人一起先后主持了上海助赈山西、直隶的活动。到“丁戊奇荒”时期的义赈活动告一段落时，他和郑观应业已成为整个义赈活动中可与谢家福、严作霖比肩的人物。

从光绪九年（1883年）起，随着义赈活动的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经元善作为整个义赈活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地位亦稳固下来。从此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经元善积极了多次大型义赈活动，在先后设立的许多重要赈所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其参与的助赈活动区域覆盖了从东

① 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载《近代史研究》，1993（2）。

② 有关近代义赈活动兴起的详情论述，可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一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③④ 参见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北到广东的广大地区，募捐地域范围则遍及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欧美、日本和南洋等地。据时人称，其前后历办各省赈捐，“募款达数百万，传旨嘉奖者十有一次”^①。就此而言，在义赈活动从兴起到发展为一项极具影响的社会事业的过程中，经元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有赖于义赈作为“第一桶金”的作用，他才得以在超越地方善士和普通商人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三

事实上，义赈对于经元善发挥“第一桶金”的作用，在“丁戊奇荒”后期就已开始展现。简而言之，正是通过义赈活动提供的机会和渠道，经元善才得以跻身于另外一项具有超越意义的新事业，即洋务企业。

众所周知，以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洋务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然而，到70年代末，由于人员和资金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困境，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尤其是李鸿章主导下的许多计划项目都进展甚微。^②通过义赈活动而名声大噪的李金镛、谢家福、郑观应和经元善等人，既以实心实力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也显示出了非凡的社会融资能力，这无疑为洋务企业建设克服其瓶颈提供了非常急需的资源。此外，也恰恰是通过赈务，他们又很快得到了加入洋务企业的机会。

光绪五年（1879年）夏，在上海广肇公所举行的一次义赈筹赈聚会上，经元善遇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李鸿章手下洋务干将的盛宣怀。这是经元善初次结识盛宣怀，后来证明也是他得以进入洋务企业的最初机缘。次年春，经元善受其他义赈同人委托，亲自携款前往直隶办理散赈事务，与当时总办直隶筹赈局事宜的盛宣怀进一步结交，并得到了晋见李鸿章的机会。^③此时，业已筹办数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在郑观应、李金镛等人的举荐下，到此次赈务告竣之际，李鸿章决定委派经元善进入织布局。经元善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这项任

①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1，《游寓》，15页。

② 参见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载《清史研究》，2009（1）。

③ 参见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命，从而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转变为一位新兴工商业的经理人。^①

不过，经元善的纺织业生涯可谓是高调开局，黯然收场。先是，他返沪后即被机器织布局同人公举主办向社会招商事宜，随即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公开集股办法，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登报广告”。这套办法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因为该局“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竟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收”。^②正如张国辉先生所说，这是近代企业在资本筹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③也正是以这次集股活动为发端，上海地区第一次形成了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可是，该局官方代表戴恒和龚照屿以“此系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为由，对这套办法以及经元善本人都表示不满和妒忌。在郑观应苦心调停无果后，经元善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于光绪七年（1881年）春借故退出了机器织布局。其后，他又有两次涉足纺织业的机会，但仍然基于其中“官气太浓”的氛围而浅尝辄止。^④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在经元善被迫退出机器织布局时，恰逢盛宣怀主办的电报局刚刚上马，从而使经元善终于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对此情况，经元善多年后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

光緒辛巳孟夏，電務正在開辦之際，陶翁（即鄭觀應）為總辦，謝綏之為會辦。適謝君病危，舉元善自代，承鄭君推心置腹，畀以全權，受任以後，勵精圖治。事屬創舉，用人極少，而南北同時興工，運料運木，絡繹于道，以一身而兼仆役之事，其勞眾所共知。……嗣鄭君專務紡織，兼會辦輪船，應接不暇，改委善總辦滬局……諸君子固皆推誠布公，善亦公而忘私。^⑤

确实，参与电报局的经营是经元善洋务生涯中最成功的一笔。直到被迫逃亡的光緒二十五年底（1900年初），他始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之职，而且，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该局亦始终是中国电报局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分局。^⑥可以说，正是依靠在电报局中的地位和业绩，经元善才得以成为名声卓著的洋务企业经理人和新兴商人群体的重要代表之一。

①② 参见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③ 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368～369页。

④ 参见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⑤ 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⑥ 参见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其编：《经元善集》。

四

甲午前后，虽然经元善的洋务生涯还在继续，与盛宣怀、张之洞等洋务要员的关系依然密切，但是其社会意识和社会角色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

这次转变的第一个契机，是他开始尝试着在义赈活动之外开辟新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光绪九年（1883年）之后，义赈活动已处于“风气大开”的局面，成为上海绅商界一项具有重大公共影响的社会事业，许多绅商都积极投身其中。特别是施善昌、李朝觐、陈竹坪等人，对于义赈活动的专注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都超过了经元善。在这种情况下，经元善“因思宇内愿力，只有此数，沪上滨海一隅，似不必务名而多树帜，人取我弃，渐渐退舍”^①。的确，大约从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最后一家赈所即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宣告撤止后^②，经元善即渐渐退居义赈活动的二线。而他尝试新事业的重要标志，则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上海县城南高昌庙附近创办经正书院，“延请名师，招致俊秀，分授中西各学”^③，这也成为他后来大力兴办新式学堂的预演。

这次转变的另一个契机，则源自于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际遇。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因清军节节失利，盛宣怀委托钟天纬拟订了一个“募义兵义饷”的计划，“请沪上协赈同人相助为理”。经元善接到这个消息后，基于“为国家振士气”的意愿，随即“跃然而兴，不避出位之嫌，驰书各处义赈旧侣”。尽管由于“和之者寡”以致这一活动不了了之，但因其中“默寓加重民权之意”，从而促使经元善在甲午战争结束之际便形成了“或从此仿泰西立议院，君民之气脉贯通”的认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次筹商义兵义饷的过程中，他通过友人介绍而接触到康有为的一些著作后，不仅明确表达了钦佩之意，而且衷心欢迎康有为拟派梁启超担任经正书院教习之举了。^④

① 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② 参见《上海文报局停收赈捐改归各公所收解启》，载《申报》，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1891年9月1日）。引自1983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第39册，382页。

③ 经元善：《上海重开经正书院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3。

④ 参见经元善：《拟筹甲午义兵义饷始末记》及附录函稿，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